



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书写探微

The exploration of Tang ynasty military governor in Han Yu's Writing

ULSZ3094 PROJECT II

金冷好

GING NIN YEE

19ALB02859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4



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书写探微

The exploration of Tang ynasty military governor in Han Yu's Writing

ULSZ3094 PROJECT II

金冷好

GING NIN YEE

19ALB02859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4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绪论	1
第一节、研究动机及目的	1
第二节、前人研究之成果	2
第三节、研究方法	3
第四节、研究难题	4
第二章、韩诗中的藩镇书写	5
第一节、军事纠纷	5
第二节、文人送别	14
第三章 韩文中的藩镇书写	18
第一节、干谒之文	18
第二节、赠序之文	24
第四章、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书写对象	30
第一节、藩镇首领之书写	30
第二节、藩镇相关人士之书写	31
结语	33

参考文献	35
附录	39

图表目次

附录1: 韩愈作品中涉及藩镇书写的诗歌及散文.....	38
附录2: 韩诗中的藩镇书写题材比例.....	41
附录3: 韩文中的藩镇书写题材比例.....	41
附录4: 论文的集评资料汇集.....	42
图1: 韩愈藩镇书写的内容逻辑图.....	45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金冷好

学号:19ALB02859

日期:2024 年 4 月 1 日

论文题目: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书写探微

学生姓名:金泠好

指导老师:余曆雄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学术界对韩愈与藩镇之研究,止于探索其与藩镇势力之关系,普遍上以其反对藩镇割据的思想或以其与藩镇首领书信往来为据,欲论证其与藩镇关系之清白。然则,探究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书写,必须考虑其时代背景、亲身经历及作品,以全面了解其藩镇书写。文章运用文学本位,把其诗文视为首要探析对象,辅以史实证诗,亦以诗证史,旨在深入认知其藩镇书写倾向。次则,文章也对韩愈藩镇书写下的诗歌及散文进行比较,以呈现其藩镇书写之全貌。

韩诗中所书之藩镇,其内容分为军事纷争之题材及文人送别之题材;而韩文中所著之藩镇,则区分为干谒之文及赠序之文。虽韩愈藩镇之书写题材繁多,然而主要在于描绘藩镇之首领及与藩镇相关的人士,诸如藩镇士兵、藩镇领地之刺史及入幕藩镇的文人。鉴于藩镇可分为割据型及非割据型,韩愈对之态度亦不同,其对待入幕不同类型藩镇之友人,亦存有差异,对非割据型藩镇及入幕藩镇之友人,其态度呈现矛盾心理。

故欲考察韩愈笔下藩镇的书写,必须审慎思量其创作时之立场及对象,方能还原其藩镇书写的真貌。下文以韩愈的诗歌及散文作品入手,考察其作品里,藩镇书写所呈现的不同题材,对作品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以探究韩愈在诗文中所呈现的心态变化以及对创作对象的态度,从而更全面地理解韩愈的藩镇书写意义。

【关键词】 韩愈、藩镇书写、藩镇、诗歌、散文

致谢

谨以此文，向诸多恩师、亲友致谢。迄毕业之际，学有所得，得之于诸多熏陶教诲，感激之情无以言表。首先，谨向母亲表达无尽之敬意和感激之情。母亲以其无私之爱，日夜教诲，悉心抚育，培育吾成人。于学业之路上，母亲始终支持鼓励，悉心关怀，使吾得以坚持学习，攀登知识之峰。母爱如春风细雨，滋润吾成长之每一寸土地。母亲之恩，难以言喻，惟愿以此致谢表达吾之虔诚心意。

次则，特谢吾之导师余曆雄先生。先生为吾求学之明灯，开我求索之道路。临深履薄之际，余先生以其博闻多识、慈明教导，启迪吾心，开拓吾视。余先生不辞辛劳，指导吾论文，言传身教，令吾成长有道。无论时逢喜庆或困厄，余先生之教诲恒为吾所依归，诚以为幸也。

最后，谨向身边好友致以衷心之谢意。友朋之间，情同手足，共患难与共胜利。是以，谢谢诸君之相助与支持，无论是学业上之探讨，抑或生活中之关怀，皆令吾感受到温暖与力量。无论前路多么曲折，有诸君相伴，则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兹谨以此文，谢母慈爱，谢师教诲，谢友情相伴。恩情在心，不敢忘怀，诚以此表吾之虔诚谢意。愿将来能回馈社会，报答恩师亲友之恩德，使之不负期望。

第一章、绪论

韩愈（768—824），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也。韩愈生长于藩镇充斥祸乱之中唐，且逢朝政多番易主，即代宗至穆宗六朝。鉴于其于代宗、德宗、敬宗朝，因年幼未涉朝政，藩镇书写未充分表露于作品中，故本文仅考察韩愈于顺宗至穆宗朝之藩镇书写。藩镇亦称方镇、藩岳、藩侯。《诗经》载“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¹；韩愈《与凤翔邢尚书书》亦誉称藩镇节度使“为王爪牙，为国藩垣”²。可见，藩镇有保卫中央之美称。然则，安史之乱后之藩镇带有贬义，有四五十余。其性质各异，主要分为割据型及非割据型。³

由于韩愈的藩镇书写非止书写藩镇，亦叙述其余与藩镇有关者，故斯篇所谓“藩镇书写”，非一般论述藩镇如何嚣张跋扈及其与中央政权之互动，而是梳理其藩镇书写中的创作对象，以探究韩愈对他们的态度如何，再论韩愈藩镇书写中的心态变化。其藩镇书写之涵义可分为二：一则书写藩镇之首领；二则书写与藩镇有涉之人，如牙兵、藩镇领地之刺史及藩镇幕僚。据本文考察，其诗歌多描绘藩首，而散文则更着墨于藩镇领地之刺史及幕僚，然而前者的数量远远超于后者。是以，斯篇着墨甚多于此二者，通过对其诗文的个列分析，以探究韩愈对二者之看法，并考察韩愈对待此两者态度之区别及韩愈对二者心态的变化。

第一节、研究动机及目的

¹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2019），页640。

² [唐]韩愈著、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与凤翔邢尚书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页226。

³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页43-45。

由于韩愈乃唯一参与淮西之役的文人，故论文择其为探讨对象，探究其藩镇书写。学界对中唐之藩镇局势已取得不少成果，大多聚焦于韩愈与藩镇之清白与否，如从韩愈与藩镇关系上的牵扯证实其并不反对藩镇等。上述研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愈藩镇书写的特征，让笔者深受启发。然而，其藩镇书写并非单一赞同或反对之面貌，而与藩镇势力之类型、情景之异同有关。其诗文中论及不同类型之藩镇时，态度各有不同。本文以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藩镇书写之双重含义、在不同背景下对诸藩镇的态度及其藩镇书写中的心态变化，以还原韩愈笔下藩镇书写的全貌。由于其官方文章多献上于皇帝，故此类文章之首务多在政治。是此，此类文章观其藩镇书写之真容，甚为不易，参考价值亦不甚高，故本文不涉及其官方文章。

第二节、前人研究之成果

学界对韩愈藩镇书写的研究较稀缺，现有之学术关注主要落于其政治生平、文学作品及学术思想。惟专就韩愈及其藩镇书写而成之专著甚寡。陈克明《韩愈述评》⁴中论及韩愈抗拒藩镇分裂、坚守中央集权之见解。刘国盈《韩愈》⁵提及韩愈对藩镇割据态度矛盾，乃“骑墙派”。彭万隆《唐五代诗考论》⁶则触及韩愈及其藩镇诗一角。文献资料的研究成果不甚丰富。陈昱杉《藩镇割据对韩愈创作及文学观的影响》⁷，指出韩愈的道统思想乃在藩镇割据之社会背景下生成。李楠《元和平藩诗研究》⁸言及韩愈平藩事迹及

⁴ 陈克明，《韩愈述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⁵ 刘国盈，《韩愈》（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⁶ 彭万隆，《唐五代诗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⁷ 陈昱杉，《藩镇割据对韩愈创作及文学观的影响》，《炎黄地理》2023年第6期，页20-22。

⁸ 李楠，《元和平藩诗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页5-93。

文学作品中对藩镇持批判态度。屈光《韩愈与藩镇的关系》⁹分析韩愈与藩首于頔之关系，论证其早年与藩镇势力并不清白。

次则，斯篇诗文引用了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¹⁰及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¹¹整理本。由于斯篇引用不同学者之注释，故后文所引注之注释取自于各家的整理本。如方世举《韩愈诗集编年笺注》¹²、何焯《义门读书记》¹³、陈沆《诗比兴笺》¹⁴、方崧卿《韩集举正》¹⁵、陈景云《韩集点勘》¹⁶等。再者，论文引用的其他集评资料整理本有《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及《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¹⁷

第三节、研究方法

本文欲突破韩愈藩镇研究中泛泛而谈之论，从史籍背景、诗文中藩镇叙事、学者评析等方面入手，以展示韩愈诗文中藩镇书写之全貌。斯篇研究探讨之际，本文拟行之研究方法如次：

1. 文学本位

本文恪守文学之原本，以细致论读文献为研究之核心立足。然研究之立足，必基于确凿材料，尤专家学者之著述尤须深审辨析。对此，本文始终视对文献之深入阅读

⁹ 屈光，〈韩愈与藩镇的关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页47-49。

¹⁰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¹¹ [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¹² [唐]韩愈撰，方世举笺注，《韩愈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页32。

¹³ [清]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

¹⁴ [清]陈沆撰，《诗比兴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196。

¹⁵ [宋]方崧卿，《钦定四库全书·韩集举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073册。

¹⁶ [清]陈景云撰，《钦定四库全书·韩集点勘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075册。

¹⁷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昌黎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及整理为基本之前提，对相关韩愈相关诗文进行周详梳理、归纳和探索，务求其全面、准确、详尽，以避空论之弊。

2. “诗史互证” 及 “文史互证”

本篇则运用诗及文为史料，通过考察诗文中的时间、区域、人物等史料，佐以史籍之佐证，以揽获历史之真实，对韩愈达致真正之“同情”与了解。其次，本文以史料考辨韩愈之诗文，佐以史家丰富之历史文化，对古诗文中或难解或典故等问题，深入地考证辨析，发觉诗文中涉及当时历史事实相关之“今典”成分，以还原韩愈藩镇书写之全貌。

3. 定量分析法：相互对比

本文抽取韩愈诗文之中与藩镇动态相关之篇章，次则重加筛选，择选之作进行研读与对比，期以探究同题材作品间之异同，以证其藩镇书写多方面之差别，以展其藩镇书写之多维视角。由是可详知韩愈藩镇书写中所抱独特见解及其多重表达。由此方法，可更精研韩愈透过文学作品所阐发之关于藩镇之思想和情感。

第四节、研究难题

韩愈之藩镇书写，涉及多层面及态度，因其个人经历及与藩镇领袖之纷繁关系，审读其对待藩镇之态度颇具挑战性。复次，观其后世学者评论韩愈诗文，因其各自文化氛围、时代见识与经历各异，故须克服个人之差异，方足周详洞悉诸集评资料。不仅如此，中唐时藩镇的多样性，为一难解之问题。藩镇分型繁多，辨清不同类型藩镇对韩愈之态度，乃为一复难之难题，是则须深探各类藩镇之特色，明了其在时世社会中之地位与功用，方可窥见韩愈藩镇书写之真相。

第二章、韩诗中的藩镇书写

元和诗人饱经德宗建中、兴元藩镇兵变之苦，对藩镇反叛所带来的灾殃铭心镂骨，描写战争已成为元和诗人的题材之一。韩诗中的藩镇诗歌主题纷杂，呈现出多面貌的藩镇书写。韩诗之藩镇书写分为两类，一乃军事纠纷，二为文人送别诗，下文对二者进行详尽的阐述。

第一节、军事纠纷

1. 贞元年间之军事纠纷

由于德宗采取姑息藩镇的政策，故贞元中期出现了相对平和的时期。此时期之军事纠纷属藩兵内乱，故并无直影响朝廷运作，如贞元十年之宣武军乱。宣武军节度使刘士宁生性残暴淫乱，在其失势后，宣武军内讧，亲兵劫掠军需物资及居民，致使众多百姓伤亡，后留后李万荣遂平之。然李万荣处事之狠辣，致百姓人心惶惶。韩愈因而作《古风》诗。樊汝霖表示安史之乱后，诸藩镇相对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不少于三四，士兵骄横则驱逐其领袖，领袖强大则叛离朝廷，不奉朝廷则不进贡，是种情况频繁出现，故韩愈托古风以寓意。¹⁸ 韩愈以“古风”为名，寓意安史之乱藩镇肆虐之古风再次席卷而来。

¹⁸ [唐]韩愈著撰、[宋]魏仲举集注，《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第1册，页158。

又，陈沆曰：“刺赋役之困也……安、史之后，方镇相望，跨州连郡。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军旅不息，重敛因之。”¹⁹ 故古风二字揭示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历史背景。诗中表示如今人们应该庆幸国家不需要动用兵力，虽然目前藩镇的局势已经受到压制，但人民仍然可以保全生命。²⁰其明面表达当下各藩安定，国家无需经历战乱和使用兵力，纵使唐朝如今面临困境（藩镇），但尚可解决。看似态度积极，实则暗讽德宗姑息藩镇。于平定宣武军一事，宰相陆贽曾表示李万荣为人卑下浮躁且张狂，当下汴州局势不稳，是强化朝廷威严的关键时机，故得藩镇军心的李氏不可委以重任，但德宗不肯听从，仍立李氏为留后，为日后汴州之乱埋下祸根。²¹

何焯表示韩愈庆幸当时不用兵，是因为战争在那时已然解决，此乃反语也。²² 再如，胡渭表示韩愈了解赋役所带来的困境，百姓无处可避，可却有人言国家如今不需要动用兵力，正是享受美食，相互欢乐之时，其言辞虽柔婉，但心意却痛楚难忍。²³ 韩愈运用反语表达当下国家安定，不用兵之“喜”，实则点明汴州藩镇问题之危急性，及对德宗姑息藩镇的不满。

韩愈借《诗·硕鼠》典故暗指上位者及各地藩镇的贪婪。²⁴由于德宗执政年间鼓励各地节度使向其进“贡”，对正在实行的两税法的弊端不作纠正，也不计节度使较取得经费的方式，致中央或地方征税当局大受其益，而百姓深受其害。²⁵韩愈不啻对当权者含沙射影，也暗讽藩镇私吞财富，导致多地方赋税都入不了中央，甚至在当地增加赋税、兵役、徭役，全方位地压榨人民。其用“汤汤”²⁶形容当前的局势，此即大水急流貌，

¹⁹ [清]陈沆撰，《诗比兴笺》，页196。

²⁰ [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24。

²¹ [宋]司马光编、[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16册，页7550-7551。

²² [清]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中册，页509。

²³ [清]乾隆御选、梁诗正辑评，《御选唐宋诗醇》（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卷29，页578。

²⁴ “彼州之赋，去汝不顾。此州之役，去我奚适。”[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24。

²⁵ [清]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页453-455。

²⁶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24。

谓全诗之诗眼。《尧典》载：“汤汤洪水方割。”²⁷谓赋役如洪水横流，无处逃避，故此“赋”及“役”犹如洪水般袭卷国家，故其有何处才是自己归处的感慨，上位者之作为及藩镇跋扈之局面让其不知何处方乃归宿。

再者，韩愈明面上表示如今天下无异动，故人民得以无所顾忌，衷于享乐，然韩愈本意并非如此。²⁸何焯云：“‘《平准书》：杨可告缗，杜周治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托之方镇，以觉其上者也。”²⁹韩愈引汉武帝于财政上征收财产税的措施，警惕当权者若对杨可、杜周此辈之人（藩镇）姑息，钱财虽通过藩镇之手流向朝廷，但藩镇的强硬举措将致人民不再蓄藏财产，终日贪图享乐。此番剥削现象恐致人民贫困化的加深，社会将陷入混乱，足见其忧国忧民之心思溢于言表。

虽宣武军乱平，但藩镇军事纠纷之苗头未泯，燎原之火终在贞元后期被引爆。贞元十五年，宣武节度使董晋逝世，刚升为留后的陆长源欲整顿军中士兵的散漫风气但处置不当，引发士兵的不满，导致汴州兵变。与作《古风》时期不同，韩愈此时已入幕藩首董晋帐下，与使府僚佐及李翱、孟郊等人交好，故对汴州之乱知之深，事发后作《汴州乱二首》描绘宣武军兵变，汴州城烽火连天之惨况。

诗云：“天狗堕地声如雷。”³⁰天狗普遍被史书记载为发生兵乱、政权不稳的象征。

³¹儒家认为一切灾异皆为上天对统治者警告，若治理者依旧不改其行，则天命将有所转

²⁷ [清]孙星衍撰、陈沆，盛冬铃点校，〈尧典·上〉，《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27。

²⁸ “好我衣服，甘我饮食，无念百年，聊乐一日。”[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24。

²⁹ [清]何焯著，《义门读书记》，页509。

³⁰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24。

³¹ 天狗，《史记·天官书》载：“天狗状如大奔星，……所堕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

[汉]司马迁撰，泷川龟太郎著，《史记会注考证·天官书第五》（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页487。又，《汉书·天文志》云：“天狗，状如大流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坠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圆如数顷田处，上锐见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汉]班固撰、[清]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4册，页848。

移，预示国家的覆亡和政权的更替。诗中运用天狗描绘叛乱之局面，同时暗示德宗切勿姑息藩镇势力，养成奸邪之风，恐致政权易主。蒋抱玄曰：“此谓德宗姑息养乱，不肯严于讨伐也。”³²又，胡渭表示此诗一曰四周藩镇坐视不管，二曰君臣互相对藩镇姑息。

33

韩愈既指责邻近藩镇安于虚衔，对于汴州军乱未施予军事支援，亦抒发对朝廷漠视之态度的愤懑。史实记载长源性情急躁，依仗自己的才能而傲慢对待他人，判官孟叔度轻浮放纵，喜好慢待和侮辱士兵，军中人都厌恶他。主帅董晋去世后，长源命令孟叔度分发盐，但士兵们没有得到更多的盐，军中对此感到愤怒，长源也没有为此事采取任何措施。是日，军士起义，杀死长源与孟叔度，并食其肉且不留痕迹。新、旧唐书对汴州兵变的叙事大同小异，《新唐书》多了“判官杨凝、孟叔度等又苛细，叔度淫纵，数入倡家调笑嬉褻。”³⁴之论述。陆长源自视甚高，性子刚烈又好改革，而其余僚佐孟叔度和杨凝等人作风不正，引起士兵极度不满，最终导致汴州大乱。杨慎论起此事云：“是长源有以自取。”³⁵《资治通鉴》也称汴州乱为“孟叔度则死有余罪”³⁶。足见汴州兵变之首犯实乃宣武军僚佐等人，而非本源为军士之逆袭帅。

反之，韩愈《汴州乱》里把宣武叛军作为这场叛乱的源头，只字未提陆长源、孟叔度等人被人诟病的作风。诗中借助“天狗”、“烧成灰”等词以渲染兵乱的氛围，更称士兵们争着杀长源，将他们贬变为兵变的主导者，诗歌内容与史臣叙事有所差异。此般原因在于其并无亲身经历此次叛乱，韩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曾言自己从旁人口

³²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 74。

³³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 75。

³⁴ [宋]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陆长源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4册，页 3772。

³⁵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 75。

³⁶ [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第16册，页 7582。

中知晓此事。³⁷然外人唯观城中残酷之痕迹，传至韩愈耳者，则自然先入为主，以为此次叛乱之罪魁祸首乃宣武叛军。

其二，韩愈对汴州之前的形势并未抱有良好印象，故入幕侍奉董晋之下，多次赞誉其安抚汴州的功绩。如《送权秀才序》“相国陇西公既平汴州”³⁸；《汴州东西水门记并序》：“嚚童噉噬，劫众阻兵……时维陇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单车来临。遂拯其危，遂去其疵”³⁹；《董晋行状》：“人心易动，军旅多虞”……汴州自大历来多兵事……既来止，东人以完，今公没矣，人谁与安。”⁴⁰等诗文既赞誉董晋安定汴州，强调先前汴州局面混乱，士兵骄横难治，同时也对董晋逝后的汴州局面透露出担心。韩愈夜闻汴州乱，当下的第一反应必定是其之前所忧虑之事已发生，自然而然将叛乱之兵视为祸首。

其三，韩愈与宣武军文职僚佐关系密切，交结之中包括汴州兵变中的陆氏和孟氏。韩愈《又寄随州周员外》曾以友人的口吻怀念故人，证实韩愈与众友之情谊不浅。董晋逝后二十余年，韩愈更是赞扬陆氏品行高洁、德才出众，杨氏和孟氏才德显赫而在朝廷上享有声名，才被招至幕府。⁴¹可见文人之间的经交游唱而形成的交情在韩愈对汴州乱的叙事中产生了影响。其四，若韩愈将汴州乱之祸首归为代表朝廷的地方官员，那诗歌抨击藩镇势力的意图便会削减，这与其一贯的平藩观念相悖。因而，其必须强调叛军的骄兵犯上，而非陆、孟等人的咎由自取，方与史臣叙事相悖。

贞元十四年，汴州兵变，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反叛。此时韩愈入张建封幕府，作《赠

³⁷ “暮宿偃师西，徒展转在床。夜闻汴州乱，绕壁行彷徨。”[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 84。

³⁸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 309。

³⁹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 90。

⁴⁰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 649。

⁴¹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 493。

张徐州莫辞酒》借杯觥交错之际敬劝张氏需对吴少诚兵变一事上有所作为。⁴²“莫辞酒”暗示张氏国难当前不应推辞，应积极应对。爪牙，如《诗》言：“予王之爪牙。”⁴³，或如《心书》所载：“勇悍善敌者为爪牙。”⁴⁴张氏为朝廷之得力臂助，理应挺身而出，率兵征讨吴少诚，故方世举曰表示“春雷三月不作响”乃韩愈见张氏并无向朝廷请求讨伐反叛者之意，故便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劝之。⁴⁵

“春雷”乃时序更替之象征，蕴涵新生，生机勃勃之意。于诗之语境中，此语乃朝廷举兵征讨吴少诚的动力和象征，但朝廷毫无讨贼之意，故韩愈表示春雷并无作响。综合蒋之翘所评：“当时四方多警，朝廷无讨贼之意，而诸将亦不奉命，故以大义推辞‘春雷’之语，意有所讽也。”⁴⁶韩愈不啻谴责临近藩镇不作为，也抨击朝廷对地方藩镇的置若罔闻，国家无法响出一声得以震慑藩镇之春雷。

《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中，韩愈同样表达与前篇相同的忠告和规劝。诗先极尽笔墨地描绘幕主张建封打马毬的情景，但结尾却转换诗意，揭示其作诗的本意。韩愈借张氏马毬之一事望其别不务正业，反之应该替朝廷讨贼。《唐宋诗醇》提及此诗歌为韩愈对张氏的讽刺之辞也。⁴⁷方世举亦云：“此盖问其军政不修。”⁴⁸韩愈以诗文表疾呼，冀望张建封能率众讨逆，但也因此遭罢黜官职。

韩愈赴长安参加吏部诠选时，作《归彭城》写吴少诚反。⁴⁹诗云：“天下兵又动，

⁴² “莫辞酒，谁为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响，战士岂得来还家。”[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79。

⁴³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上册，页408。

⁴⁴ [三国]诸葛亮著、段熙仲，闻旭初编校，《诸葛亮集·腹心》（北京：中华书局，2020），卷3，页132。

⁴⁵ [唐]韩愈撰，方世举笺注，《韩愈诗集编年笺注》，页32。

⁴⁶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79。

⁴⁷ “‘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盖讽之也。”[清]乾隆御选，《御选唐宋诗醇》，卷29，页580。

⁴⁸ [唐]韩愈撰，《韩愈诗集编年笺注》，页35。

⁴⁹ 《新唐书》载：“贞元十五年三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反。九月，（诸军）讨吴少诚。十二月，诸道

太平竟何时？”⁵⁰指吴少诚谋反一事，并对在朝官员表达了不满及提出了质疑。《唐宋诗醇》提及韩愈在动荡的时刻感到悲伤和愤怒，心中无法释怀。骑马行走在空旷的陂塘上，哭泣声不减少，就像穷途之中的哭泣一样。⁵¹；查慎行亦表示韩愈心中充满了不合时宜的怨愤，却无处发泄，只能在这里稍微吐露一些，但终究无法完全宣泄出来。⁵²集两家之言，韩愈心头积郁沉闷已久，先前劝谏张建封攻打吴少诚未果，竭力为国家谋划反而遭幕主罢黜；王师讨伐吴少诚接连溃败，国家陷入多事之秋。其心境愈发沉重，国家和个人所追求的理想不可兼得，内心倍感忧愁，故此诗油然而生。

2. 元和年间之军事纠纷

元和元年，刘辟谋反。⁵³《东都遇春》云：“谋谟收禹绩，四面出雄劲”⁵⁴，一指元和元年高崇文、李元奕及严砺、东川李康“四面”合兵招讨刘辟；二曰恒冀节度使王承宗反，朝派恒州四面藩镇各自进军讨贼。对于讨蜀一事，黄裳曾规谏宪宗必须制裁藩镇。⁵⁵宪宗因而兴师伐蜀，悉为黄裳之力所成。诗云“谟”即谋，朝廷有谋，将士有“雄”，讨刘辟一事于韩愈眼中可谓君臣相辅相成，有勇有谋也，故斯篇可见韩愈对当前形势赞叹颇多。

藩镇军事纠纷题材之诗再次面世，已是元和十二年淮西之役。上文提及被平定的数

兵溃于小浥河。”[宋]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德宗纪》，第1册，页128-129。

⁵⁰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79。

⁵¹ “忧时伤乱，感愤无聊。骑马空陂，不减穷途之哭。[清]乾隆御选，《御选唐宋诗醇》，卷28，页566。

⁵²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119。

⁵³ 贞元元年，西川节度使韦皋逝世，刘辟有意接任一职，但朝廷令其入朝担任给事中。刘辟早已怀有割据西川的野心，因此拒绝执行命令，但宪宗出于初登帝位、朝政不稳的考虑，最终改任命刘辟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事务知节度使。元和元年，刘辟请求朝廷批准他同时担任剑南东川、西川、山南西道三川节度使。宪宗予以驳回，然而刘辟无视宪宗的诏令，对东川节度使李康所在的梓州发动进攻，计划以武力夺取东川，并进一步夺取山南西道，实现其割据三川的野心。

⁵⁴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713。

⁵⁵ [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第16册，页7627。

个藩镇，在当时势力相对薄弱；而对中央统治构成最为威胁的是河朔三镇，它们相互勾结，寻找其破绽颇为困难，此为朝廷真正的心腹之疾。此役，宪宗坚持用兵，韩愈被封为彰义军行军司马，随裴度东征。韩愈随军出发前作《赠刑部马侍郎》一诗赠于从度平蔡的刑部侍郎马总，表示其对强藩之轻视，及完成使命后回朝显功的决心。此时韩愈心怀国家安宁的美好愿景。

期间，韩愈单身匹马赴汴州说服宣武军节度使韩弘为淮西之役献上一臂之力。韩愈路经鸿沟，遂感慨历史之长河，作《过鸿沟》。⁵⁶韩醇提及汉高帝四年，项羽与汉中分治天下，划定鸿沟以西为汉地而东为楚境，此时项羽解甲而归，刘邦也欲返西，但经过张良、陈平的规劝，遂停止此举，最终战胜。⁵⁷鸿沟乃荥阳东南二十里，当年楚军与汉军对峙于荥阳，项羽受到平国君劝说，解甲东归，最终遭汉军追击而败北。淮西一战之成败，实系宪宗一念之权衡，时则主和派咸言宜罢兵，然罢兵则将养虎遗患，对中央后患无穷，故王元启谓之“此真劝回马首之论也”⁵⁸。

韩愈为自己所谋之事深感自豪，故将己身与裴度视为张良、陈平等忠臣良将。彼等舍生忘家、孤注一掷的豪情决志，与百无一用的主和派形成鲜明对比。是此，方世举表示此诗虽歌颂楚汉时期的事迹，但实际上指讨伐淮西一事，当时有些官员阻挠这项计划，几乎破坏了计划的进行。⁵⁹对此，韩愈用楚汉之典故，提醒唐王朝要以此为惩戒，不可有退缩之意，同时以委婉之辞将自身与裴度等将士巧妙抬高，实属巧妙之笔。

韩愈自汴州归至郾城行营，遂作多诗。程学恂曰：“同心破贼，故尔十分高兴。”⁶⁰

⁵⁶ “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1033。

⁵⁷ [唐]韩愈撰，《五百家注韩昌黎集》，第1册，页158。

⁵⁸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1034。

⁵⁹ [唐]韩愈撰，《韩愈诗集编年笺注》，页442。

⁶⁰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1037。

韩愈说韩弘事成，士气正高涨，可见班师回朝之日指日可待！韩愈作的众多诗歌当中，字里行间皆为其对胜利的美好憧憬。最后，韩愈再有佳作问世，实为淮西之役全面告一段落，获胜凯旋而回朝之际。淮西一役大获全胜后，韩愈返长安的路途日益临近，其思绪已飘到那旌旗风舞，得胜回朝之壮丽景象，心痒难挠以至于无法入眠，其所至之处均有诗篇问世。为此程学恂曰：“数诗皆可作凯歌。”⁶¹，蒋抱玄亦云：“快事快调，此公一生最得意时”⁶²，所称甚是。

3. 长庆年间之军事纠纷

唐宪宗驾崩后，藩镇又趋复炽，唐朝统治进一步急遽衰落。长庆元年，镇州军乱。⁶³韩愈为兵部侍郎被派往镇州宣谕。百官畏缩，唯有韩愈敢躯赴险地。⁶⁴此次险途，韩愈又有一系列诗篇以记其事，如途径太原所作之《奉使常早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地失嘉禾处，风存蟋蟀辞。”⁶⁵方世举表示“蟋蟀”之辞乃讽刺晋僖公。⁶⁶其劝诫晋僖公约束自身娱乐，切勿沉湎于荒唐之事。长庆二年，穆宗于麟德殿观赏各种杂伎音乐，向给事中丁公著感慨公卿百姓频举欢宴乃当下国泰民安之兆，其甚感宽慰。丁公著则对天子表示陛下应该发布命令，禁止他们过度放纵，如此天下将会受益良多，当时朝廷沉迷

⁶¹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1066。

⁶²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1069。

⁶³ 长庆元年，镇州军乱，王廷凑杀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自称留后；长庆二年，王廷凑围困牛元翼于深州，裴度、李光颜、陈楚前去营救，均未成功，朝廷此时已然财竭力尽。二月，王廷凑的围攻深州愈发紧急，朝廷别无选择，只能退步任其为成德节度使，后朝廷委任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向王廷凑军宣谕朝命。

⁶⁴ “王廷凑屠衣冠，围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大虺虺，先生奉诏入贼，渊然无事行者。既至，召众贼帅前，抗声数责，致天子命，词辩而锐，悉其机情，贼众惧伏。贼帅曰：“惟公指。”公乃约之出元翼，归士大夫之丧。功可意而复，穆公大喜，且欲相之。”[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7册，页6460。按：全名为《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

⁶⁵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1232。

⁶⁶ [唐] 韩愈撰，《韩愈诗集编年笺注》，页546。

于酒宴享乐，韩愈故对此进行讽刺和批评。⁶⁷ 韩愈诗篇中所言即穆宗沉湎于酒乐一事，故方成珪曰：“雪王廷湊罪，复以为节镇，非公意也。故此诗有微词焉。地失嘉禾，言太平无象。风存燃噍，警太康也。结则忧深思远，可于言外得之。”⁶⁸ 由此可知，韩愈对王庭湊获赦一事颇有微词。如今国家无太平之兆，风起云涌，而皇帝与朝中贵族竟沉迷声乐，韩愈故此诗劝谏。

要之，韩愈所撰有关藩镇军事纠纷之诗，可分为贞元、元和及长庆三时期。贞元年间，由于德宗采取姑息政策，其诗批判意识浓厚，悲怆情绪深沉。其作多以“怨”为主，如抨击作乱之藩镇及牙兵、朝廷及临近藩镇之不作为。然则，其元和之诗则转明朗生动且快腔快调。此因其入主权力核心，且乃中唐历史上唯一参与平淮西之役的文人。韩愈夙愿达成，故其于战争前后不断撰写诗歌，较之早期作品更具纪事性质。由于亲自前往前线，故与其他撰写平藩诗的文人相比，此为其平藩诗别于他人且独具特色之处。长庆之际，韩愈已年迈，且饱经风霜，故此时之诗篇不复早年之快意潇洒，而更彰显静水流深的意境。

第二节、文人送别

《唐音癸签》曰：“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躐级进身。”⁶⁹ 又，《唐语林》载：“游宦之士之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⁷⁰ 由此

⁶⁷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1册，页553。

⁶⁸ [清]方成珪撰，《续修四库全书·韩集笺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310册，页1233。

⁶⁹ [明]胡震亨撰，《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27，页284-285。

⁷⁰ [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8，页683。

观之，藩镇幕府在文人仕途中占据重要地位，军中幕府职务常由文士担任。唐代文士若入幕府，则官阶晋升较快，然真正将幕府视为要津者，主要为那些虽获进士资格却未能进入朝廷，或在京城仅担任微官俸禄微薄者。他们一生理想仍在于朝中为官，只在仕途不如意时，才至边地幕府，但无不盼望早日回京，升迁为官。⁷¹

文人入幕已蔚然成风，以藩镇幕府为主题的创作比比皆然，藩府为文学题材之诗，亦涵盖对入幕文人之送别诗。⁷²如韩愈于元和四年之《送侯参谋赴河中幕》一诗描述其送别亲友侯继赴河中节度使王锬处担任幕职之情景。诗云：“泯泯司徒公，天子爪与肱。提师十万余，四海钦风棱。河北兵未进，蔡州帅新薨。曷不请扫除，活彼黎与烝。”⁷³

司徒公即王锬，新、旧唐书皆载其管辖军队有素。⁷⁴ 同代文人白居易亦称其自领大藩，累彰卓越之功，施恩济民，彰显治理之正道。⁷⁵与史实对照来看，王锬实为兵略高明的将领，忧及黎民百姓，且对军财治理亦有卓越之功绩。加之，王锬曾参与讨伐叛军李锜，可谓一方之军政楷模。是以，韩愈称其为爪肱，虽“提师十万”或带有夸张成分，然彰显王锬卓越手腕及才能。

“四海钦风棱”，足见其评价之高。顾嗣立曰：“《汉·李广传》言‘威稜愴乎都国’，李奇曰‘神灵之威曰稜’”⁷⁶，可知“稜”即为神灵之威，乃威风凛凛之表现，故韩愈希望其得以讨伐叛军，威慑王承宗。所谓“河北兵未进，”指的便是此事，“蔡

⁷¹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页11。

⁷² 藩府为文学题材之诗亦包含幕僚之间的幕府联句，如韩愈及孟郊的《征蜀联句》，及幕僚对幕主的忠告劝诫，如《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赠张徐州莫辞酒》诸篇。

⁷³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716。

⁷⁴ 《新唐书》载“河东自范希朝讨镇无功，兵才三万，骑六百，府库残耗。锬补完畜费，未几，兵至五万，骑五千，财用丰余。”[宋]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王锬传》，第5册，页4008-4009。《旧唐书》又言：“寻除容管经略使，凡八年，溪洞安之……时方讨镇州，锬缉绥训练，军府称理”[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王锬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4册，页2759。）

⁷⁵ “自领大藩，累彰殊效，惠安百姓，表正一方。”[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3册，页1150。

⁷⁶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719-720。

州帅新薨”即淮西节度使吴少诚逝世，部将吴少阳杀吴少诚之子，自立为留后。割据型藩镇通常以嫡长代领父之军务，此般有损中央朝廷权威的条例，韩愈自是对之深恶痛绝。为此，其借《送侯参谋》一诗望王锬上书朝廷扫除王承宗及吴少阳这两股势力，拯救藩镇统治下的黎民百姓。

为表示其决心，韩愈更言恨不能马上脱去文臣的儒冠，报效疆场。⁷⁷韩愈当时正任都官员外郎，尽管身上带着其他职务，但其对国家大事尤为关心。⁷⁸其甚至想面见皇帝，但碍于文臣身份不合适，而不敢轻举妄动，故盼王锬得以奏请朝廷扫除割据藩镇之势力。虽《送侯参谋》以赠予侯继之名而作送别之诗，然其中所抒发者，实则不在于主角侯继，而在于韩愈自己之思绪。次年六月，韩愈友人石洪入幕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处，其遂作《送石处士赴河阳幕》一诗：“长把种树书，人云避世士。忽骑将军马，自号报恩子。风云入壮怀，泉石别幽耳。”⁷⁹将军即乌重胤，因欲商讨讨伐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之计，故招石洪至幕中任参谋。元和五年，王承宗当时居常山一代，依仗险要的地势对抗朝廷，故其曰：“钜鹿之师欲老，常之险犹倚仗。”⁸⁰

《新唐书》载石洪“十余年隐居不出。公卿数荐，皆不答。重胤镇河阳，求贤者以自重，或荐洪……洪亦谓重胤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礼之。”⁸¹足见，石洪并非借隐逸以抬高出仕身价的假隐士，而是一位操守高尚的士人，其之所以应召而来，而是因乌公伯乐识马之缘故。然而，张鸿曰：“有讽意，合之送序，公意可知。”⁸²合韩愈为石洪所作的另一篇《送石处士序》观之，可见其对乌公带有戒心，希望乌公当守

⁷⁷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页716。

⁷⁸ 韩愈此时分司东都。都官属刑部，韩愈虽为都官员外郎，却判祠部。祠部属礼部，掌祠祀、享祭、天文之事，属文臣。此与其期望之官职不符，无法捐躯报效国家，故愿意以死明志向王锬示其决心。

⁷⁹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738。

⁸⁰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738。

⁸¹ [宋] 欧阳修、[宋] 宋祁撰，《新唐书·石洪传》，第5册，页4022。

⁸²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739。

初心，为国而求士，非图私家之利也，忠诚效力于朝廷；至于石处士则勿图利于乌公，故“有讽意”。窃以为，比起乌公，韩愈的“讽”更多在于石洪，如末两句之“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⁸³含有责怨石洪归隐未出仕之意，藩镇肆虐，石洪先前却无所作为，此非正当之选也，故韩愈表示国难当前，石洪应当速行而不宜再如先前般拖延。

朱彝尊亦称该诗“末二句则责备”⁸⁴，窃以为正是此意。综上，韩愈藩镇题材里的送别诗，悉涉王承宗之叛变。《送侯参谋》一篇，韩愈陈己与侯继仕途坎坷之回忆；其次，期许王锸讨逆王承宗以及自身志向；末段即为侯继之送别与对未来忧虑之词。此篇长而详细，然别侯继仅寥寥数语，实旨在抒发己志。至于《送石处士》一篇，短而精悍，石洪冀其速奔乌公幕职，别友之伤感甚少，显见战事迟滞对韩愈心境的变化。两篇之所不同，不独因战局紧急，亦因韩愈对广大隐士之期许。虽韩愈屡次“歌颂”隐士，实则对隐士持否定见解，从未真正思及隐逸，其归隐言辞可被视为抒发牢骚而已。

如其《圯者王承福传》曾明言其不喜独善其身者，因为他们鲜少为他人着想，此般不肯为自己而利天下的人便是如同杨、朱二人一样。⁸⁵因此，在韩愈眼里，石洪归隐十年而无所作为如同杨朱之辈，圣人贤者必须“兼济天下”，可见韩愈对其颇有怨言。当石洪得报效国家机会，韩愈方才催之，故全诗毫无《送侯参谋》般饯别之伤感。

⁸³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739。

⁸⁴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740。

⁸⁵ 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下册，页59。

第三章 韩文中的藩镇书写

韩文中的藩镇书写可分为干谒及赠序两类文章。下文考察韩愈干谒之文，其干谒之目的可分为科举引荐、官职引荐、入幕自荐、及施财请求。其干谒文之对象乃诸藩首，而赠序文的对象除了藩首也涵盖了往藩镇领地赴任的官僚及幕僚，故其赠序文可分为官僚赠序文及文人赠序文。下文将对两类文章的藩镇书写详加探讨。

第一节、干谒之文

中晚唐之际，进士科比起明经科备受推重，近士考试愈发艰难。士人之间相争日益剧烈，视争夺官职为当务之急，故士人多采取投刺干谒之法，干谒请托之俗风愈发盛行。钱穆《记唐文人干谒之风》亦曰：“唐代士人干谒之风特盛”⁸⁶，“唐人干谒之风实至晚而弥烈”⁸⁷。然如韩愈之辈，于唐之时具备超然之精神与使命感，亦在时势之牵系下，毫不畏惧地奔走干谒，无以为耻，其干谒之对象亦涵盖藩镇势力。韩愈投献于藩镇的干谒文共有三篇，即《上贾滑州书》、《与凤翔邢尚书书》及《于襄阳书》。

88

1. 科举引荐

贞元六年，韩愈首次应试进士科，此时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容斋四笔》提及或有

⁸⁶ 钱穆著，〈记唐文人干谒之风〉，《中国文学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页300。

⁸⁷ 钱穆著，〈记唐文人干谒之风〉，页311。

⁸⁸ 对于并无求助的目之干谒文，如《上张仆射书》等皆不见意图求官或高迁之意，故本文将其排除在外。

考生，欲觅权贵、与主试者交谊深厚者，望借此以提升得中之机会，送行卷即方法之一。

⁸⁹ 韩愈首次应试，作《上贾滑州书》，献行卷于贾耽。⁹⁰贾耽当时乃滑州刺史兼义成军节度使，权势不容小觑，然韩愈与贾耽先前并无任何交情。愚以为，韩愈送行卷于贾耽的原因乃贾耽为人正派。新、旧唐书亦言其脾性佳，待客友善，有君子之风，故韩愈希送行卷于贾耽，望得到推举之几率大大提高。⁹¹

《书》曰：“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则铿然鸣，盖气之感，非自鸣也。”⁹²道出其来意。《山海经》云：“(丰山)有九钟焉，是知霜鸣。”⁹³九钟鸣，乃因霜降，钟无法自鸣，有感于气而后方可鸣乎；人也无法自鸣，只有获得有力者的赏识方可能鸣起来，此为来意也。申明来意后，韩愈紧接道出送此行卷的目的，即其自称言行不敢违背古人的规范因而认为自身愚昧而执著，故敬仰明晰古代的经典义理、言行真实又维护皇权的贾氏。⁹⁴最后再表示自己往后的仕途全凭贾耽的手中，尽显卑微之态。⁹⁵

韩愈言行谨守古人准则，则应遵从古人之规范。然同时又对贾耽赞美为“昭融古之典义”⁹⁶，语辞略见矛盾。实则不然，韩愈特意指出自己过于奉行古人规范，并言其无法维持生活，既可符合贾耽之为人，不仅让其有共鸣，还能使其生出怜悯之情，实

⁸⁹ “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助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下册，页686-687。

⁹⁰ “行卷”，谓应试者将已作编撰，成卷轴以呈递，于考试之前赠予于时社会、政治或文学界备受景仰者，恳请其向主试人引荐，以增其入选之望。

⁹¹ 《新唐书》云：“检身厉行，自其所长。每归第，对宾客无少倦，家人近习，不见其喜愠。世谓淳德有常者。”[宋]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贾耽传》，第5册，页3950。《旧唐书》亦载：每自朝归第，接对宾客，终日无倦……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贾耽传》，第3册，页2575。

⁹²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页735。

⁹³ [西晋]郭璞撰，《山海经·中山经》（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页51。

⁹⁴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下册，页735。

⁹⁵ “进退之际，实惟阁下裁之。”[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下册，页735。

⁹⁶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下册，页735。

属巧妙。随后，韩愈把贾耽夸得天花乱坠，亦非强词夺理，因韩愈所称赞之点乃合乎其人格思想，故奉承之辞更显真诚坦率。夫安知韩愈之志向哉？自是韩愈随之所攜之“十五章”⁹⁷文章也。对此，贾耽曾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时任义成军节度使，属于藩镇之一，然韩愈相较于其藩镇身份，更多因其为人及权势而有求于他。是此，虽然其本身具有特殊性及游离性，但韩愈对于藩镇之长官，并非一味反对，而是区分看待。

2. 官职引荐及自荐入幕

依唐制，欲仕宦者，需经礼部之考核，方得列名为进士。然获进士之资者，尚须赖以吏部之选拔与考试，方乃正式被委以官职，方能释褐。⁹⁸中唐以后，文士有已经礼部试及第，而吏部试不合格者，则方镇幕府谋求仕进，如韩愈就是。韩愈又举博学鸿词科落第，游宦凤翔之时，上书《与凤翔邢尚书书》于凤翔节度使邢君牙。邢君牙，兼掌凤翔、陇州观察使之权，并荣膺检校士部尚书之衔。是故，韩愈风目的显然是有两个，即官职引荐及幕职自荐。由于唐代节度使和观察使具有荐官的权力和义务，韩愈正是希望得到凤翔陇州观察使邢君牙的举荐之力，尽快得一官职。

《书》中始终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普通布衣之士与王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将其自身与王公的地位视为对等，以此合理化自己干谒之举，如其表示王公大人之功业，若无庶民之称颂，便无法扩大其名声，虽然庶民地位卑微，却不会奉承谄媚；而王公大人虽然地位尊贵，却不会骄傲自大，故彼此相需，相辅相成。次则，其质问邢氏能否担负得起大丈夫之志向，言其待士之态度或存不周，致使种种问题产生，言外之意则示意邢

⁹⁷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下册，页736。王佺提及唐代许多干谒文都会附带呈献一些纯文学创作，以为谒见之资，这包含了举子行卷的性质。这些用以干谒的文学作品，只有借助干谒书启才能发挥干谒的作用，可以说投献干谒书启是执贽干谒的必要条件之一。（王佺，〈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比较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页150。）因此，此“十五”卷可能为韩愈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附上于贾耽，以增强干谒之效果。

⁹⁸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页202。

氏当予其特殊礼待。接着，韩愈表达对邢氏之期许与敬意，希望邢氏能慎听其思想，及其对士人选拔与待遇之建议。文章逻辑严密，环环相扣，既树立了自己“贱而不谄”的士人形象，又真诚地向权贵的称誉坦率地以诚相告，并无对上位者才能无边际的夸饰，自负自夸之言辞也无痕迹显露，可谓极具心思。

俨然文风不卑不亢，有理有据，但韩愈终究不得意去。诚如戴伟华所言“以主观或情理来解释干谒者与干谒对象之间的关系，带有理想色彩，充满自信，而事实上于此途获成功者鲜矣。”⁹⁹文中提及“布衣之士虽甚贱而谄”¹⁰⁰，显然意在防范贫贱布衣向上自荐之举所引发的负面评价。然或许韩愈过于谨防被视为谄媚权贵，因而多有建言质询，暗示自应受到优待。虽文章中对上位者进行了称赞和尊敬。然窃以为，前文之词或显过于唐突，致激起上位者之逆反心理，遂致自荐失利。¹⁰¹如上所述，足知韩愈对干谒之事颇存忌避之态，虽文中对其有奉承¹⁰²，然文章间亦终究不失其风骨。

3. 官职引荐及施财

贞元十六年，韩愈蒙拔授正七品四门博士，终于释褐。由于官位不大，遂不满目前之官职。其于《古意》中表示自己欲得好吃又能治病的玉井莲，然“青壁无路”¹⁰³，无法取得玉井莲。这暗示其欲上升却无法如愿，此指韩愈无法得到想要的官职，故有不得玉井莲之感叹。为此，韩愈多方献佞，请求荐引，如贞元十八年所作之《与于襄阳书》。于襄阳即于頔，乃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节度使。中唐以来，中央政府难以制约方镇，德宗只得委任其为襄阳大都督，故号称于襄阳。

⁹⁹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187。

¹⁰⁰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页226。

¹⁰¹ 韩立新提及干谒诗的重点则不是务求辞章的巧丽，而是务求对干谒对象心理的应合。（韩立新，《唐代干谒诗中的士人形象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页34。）若按照此论述，韩愈干谒失败亦无道理，因其文章对上位者而言甚犀利，故邢君牙不会理会之。

¹⁰² “愿少立于阶墀之际，望见君子之威仪”[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页227。

¹⁰³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页188。

史书皆载于頔权倾朝野，皇帝一味姑息于藩镇，导致其无法无天。¹⁰⁴由于于頔当时权势滔天，这或为韩愈上书之原因，因于頔若接纳韩愈的干谒，则韩愈向高位迈进之可能性更甚。《书》开篇云：“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之前焉。”¹⁰⁵道出韩愈之来意。前，谓之援引，即希望于頔能援引己，使得自己享有盛名，显赫于当世¹⁰⁶，可见韩愈之目的乃求官。表明来意后，韩愈便向于頔道出上下相须之理，彼认上位者不得遇才学出众之下者，因下属拥有能力也不愿意阿谀奉承上级，上级则背负着自己的职位却不愿意关心下属。¹⁰⁷故上位者不能言下者并无得以举荐之人。

其次，韩愈以“侧闻”的方式对于頔称颂一番，随后话锋一转言自己未闻后辈得其赏识与礼遇，并为于頔推想好理由，即“求之而未得……未暇礼”¹⁰⁸。此举既彰显其不谄谄、奉承，亦为对方提供良好辩解，故而给予上位者台阶下之机会。韩愈随即表明己虽不才，然自视为頔所寻求之贤才，遂借“燕昭王招贤”¹⁰⁹之典故，曰“古人有言：请自隗始。”¹¹⁰以古人之言求于頔厚待身为贤士的自己，故韩愈后言道今之所急，惟朝夕饮食与仆役之费，唯需费君一日之消费便足矣。此言除表现其处境之困窘，望于頔能慷慨相助外，也使其坦然陈乞之举显得有理有据。¹¹¹

¹⁰⁴ 详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于頔传》，第4册，页2809-2810。[宋]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于頔传》，第5册，页4029。

¹⁰⁵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206。

¹⁰⁶ 俞钢《唐代进士入仕的主要途径及特点》把使府辟署入仕的目的分为选择自由、才干得以施展及俸禄可观。俞钢，〈唐代进士入仕的主要途径及特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页101。虽前二者韩愈之文并未明言，但文章里表明于頔腰缠万贯，而韩愈此时囊中羞涩，故若其入幕于頔处便可获得可观的俸禄。因此，愚认为，虽其文章明言需要钱财救济，但其实也在暗示于頔可邀其入幕，故其文章带有两种目的。

¹⁰⁷ “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206。

¹⁰⁸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207。

¹⁰⁹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207。

¹¹⁰ 据《战国策》所载，燕昭王请教郭隗如和获得贤士，郭隗建议昭王礼贤待士“先从隗始”，燕昭王从之，为郭隗专门建造房屋，并拜他为师，后贤士纷纷慕名而来。[汉]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下册，页1684-1685。

¹¹¹ 游胜辉提及“韩愈干谒书中自我形象一正一反、一先一后的并陈，也正可视作章法安排上的一扬一抑。

相比前文之干谒对象，于頔更受史书诟病，故《颜乐亭颂》言韩愈不惜牺牲自己的原则和尊严也要为五斗米折腰。¹¹²又，刘咸炘认为于頔的人品和文风并无值得称道之处，韩愈之举乃谄媚之举。¹¹³清人方宗诚则为之缓颊：“昌黎之上书求人，原欲出而济世，非尽出于干富贵之鄙怀。然究竟止当存忧天下之心而守素位而行之分，不当如此急急也。”¹¹⁴其认为韩愈并无自贱之意，而是出于济世之心，但又无法达成，只能在形势所迫之下向于頔求助。

愚以为上述言论皆有其道理，但韩愈乃迫于生活所需而不得不为。贞元十七年之《与李翱书》已表示，其在徐州时已“家累仅三十口”¹¹⁵，负担甚重。及至一家众口移居长安，米珠薪桂之际，家计愈发窘迫。加之，四门博士只是个闲官，俸禄微薄，故为求职及维持生计之需，韩愈方始上书于頔。《书》中备受诟病的乃韩愈对頔所作的赞颂之辞。然其以“侧闻”方式称颂，故亦不可谓之阿谀奉承。此乃一种书写策略，既不背离己心，亦不得罪于頔。再者，韩愈以上下相须之理，成功使自身在干谒语境中，与上位者的距离缩减，且减轻了自身所承担的道德舆论压力，既有理有据，亦不至于过于卑微。《送许郢州序》后论起此事曾表示于襄阳认同自己说的话¹¹⁶，足见韩愈〈书〉中的干谒书写策略深得于頔的心。

此外，由此隐微传达出的讯息可能是……因为他有才却穷困如斯，才更有主政者注意、举荐的必要性。”游胜辉〈论韩愈干谒文中的自我形象塑造〉，《彰化师大国文学志第》2018年第36期，页83。由此观之，韩愈之生活处境或许并非如文中所描绘者般穷困，其如此表达之目的，乃欲显示已有才华然穷困交迫，以引起干谒对象之注意，增加干谒成功之机率。

¹¹² [宋]司马光撰、王云五主编，〈颜乐亭颂〉，《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卷66，页824。

¹¹³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唐学略》（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第3册，页1235。

¹¹⁴ [清]方宗诚撰，〈读文杂记〉，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6册，页5720。

¹¹⁵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199。

¹¹⁶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264。

综观韩愈之藩镇干谒文，其内容可分为引荐、自荐及施财三类。由于干谒文带有功利目的，因而其所撰之文皆夹带着赞颂之辞。对于品行端正之藩镇，韩愈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夸赞；而对于品行受诟病之藩镇，韩愈则采用侧听之手法进行赞美，显见其不违心之用心良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维持生计及谋求官职之考量下，其亦与嚣张跋扈之藩镇交往，并非仅限于与清白之士为伍。次则，韩愈未及第前献给贾耽的文章，态度谦恭谨逊，而及第后对邢氏的干谒则稍显冒进，因此此书未能得贾耽器重。至于于頔，韩愈虽对其进行质问，但随即给予对方台阶下。由此可见，其具备一定的写作策略以符合目的，即通过塑造自身为困苦不得志之形象以获得同情，及树立敢于直言之贤士形象以掩盖自饰心态。

第二节、赠序之文

赠序文可溯及魏晋南北朝之时，但其皆附属于赠诗，未曾独立成文，也尚未形成赠序文体的写作规范。而于中晚唐之世，其渐次臻至成熟，尤其是韩愈等文士为其代表，著述诸多赠序文。韩愈乃唐代创作赠序最多，得到评价也最高的文士。¹¹⁷韩愈涉及藩镇的赠序文分别为赠予藩镇官僚之赠序文及赠予入幕藩镇文人之赠序文。

1. 官僚赠序文

韩愈所撰之藩镇官僚赠序，以赠者政绩品行为主，同时含蕴劝谏之意，以告诫藩镇为主旨。如贞元十九年之《赠崔復州序》及《送许郢州志雍序》即借送友人赴任刺史，

¹¹⁷ 明代吴讷曰：“近世应用，唯赠送为盛。当须取法昌黎韩子诸作，庶为有得古人赠言之义。”[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页42。清人姚鼐亦对其予以褒扬：“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清]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序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29。

实则劝诫藩镇军阀于頔一事。樊汝霖表示郢州和复州都在唐悉隶山南东道，韩愈于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于頔，于頔当时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¹¹⁸ 公于《赠崔復州》一文先道“刺史之荣”，继而言此序之要点即“刺史之难为”。¹¹⁹ 由于下民接触上位者机会稀少，故时则“不得其所”，遭逢不公待遇亦无以“自辨于县吏”，以致地方官吏之征收赋税及尸位素餐，皆可致百姓之疾苦。此等乃为刺史当思解之难题。“赋有常”，指朝廷赋税之定，则不因水旱疫疠之际稍有松弛，故人们的田地房屋等不动产无法稳定。

《送许郢州》亦表达相同之情景。韩愈对友人许志雍表示人们之资产已竭，而征税不止；人民已贫困，而赋税愈加紧迫，若不为盗贼，亦属幸矣。¹²⁰ 据韩愈所撰《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述及当时京师一带遭受旱灾，百姓“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路沟壑。”¹²¹ 朝廷征收赋税，使百姓流离失所，且灾病无法预测，百姓安得有固定产业收入？故其坦白道观察使常常着急催促百姓交纳赋税，而不是根据州中的情况来决定，故刺史无法安心处理自己的职责，观察使也无法实现其治理的目标。¹²² 韩愈于《送许郢州》一文里之言辞更为直白，多次表达节度使不应急于敛财，暗示于頔应廉洁自律。

复次，韩愈接着表示身为刺史应与上级有良好沟通，上级应信任身为下级的州刺史。州刺史虽责一州之民生疾苦，惟下级县令则未能随时呈报局势；刺史欲解民困境，及时奏闻上司节度使，然不得其信任。此即《赠崔復州》所指“连帅不以信”。韩愈相信崔君的为人可让百姓“复苏”，而“于公之贤，足以庸崔君”¹²³。愈文末道于頔贤能，定

¹¹⁸ [唐] 韩愈撰，《五百家注韩昌黎集》，第3册，页978。

¹¹⁹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册，页278。

¹²⁰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册，页264。

¹²¹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册，页255。

¹²² “为观察使者，恒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观察使不得其政……诚使刺史不私于其民，观察使不急于其赋”[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册，页264。

¹²³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册，页264。

能重友人崔君，二者必能相辅相成，为人民作出贡献。此般言辞亦在《送许郢州》有所表现，如“有以事乎上，有以临乎下，同则成，异则败者皆然也。”¹²⁴众人皆知于頔殺戮不辜，恣行凶暴，故韩愈不啻希望于頔廉洁自守，也望其得以善待及信任崔復州及许郢州二人。

韩愈于二文中对于頔予以褒奖，如表示于氏乃贤者，为当今少有的人才¹²⁵，望于頔之作为得以如其所愿。众人皆知于頔殺戮不辜，恣行凶暴，故韩愈此番赞美之言，旨在讽谏，望于頔停止横征暴敛，廉洁自守，实施仁政。为此，陈景云表示这个序言专门针对于頔这种贪婪敛财的官吏而写，故韩愈用《诗经》的语言来做反讽，而称赞崔氏的仁德，乃痛乎其言之矣。¹²⁶韩愈借《诗经·硕鼠》道出其赠序之旨，文章直指民生困顿皆因上位者之过，但文辞委婉，藏锋敛锐，实为讽谏而非讽刺也。

2. 入幕赠序文

由于藩镇之使府辟署制度得以直接委任幕僚，而藩镇节度使之人事权和监察权，也导致藩镇对州县官员的任免具有实际的控制权。布衣之士只需其才干得到节度使的认可，即可被征辟为幕僚，故许多仕途不如意之文人便可借此入幕。韩愈之赠序文也常赠序于投身藩镇幕府之友人。

贞元十九年，韩愈赠《送董邵南序》予即将赴河北的董邵南。韩愈此前已和董氏有所来往，贞元十五年的《嗟哉董生行》表示董氏求举不利，故投身于河北地区。¹²⁷时河北地区之藩镇乃河朔割据型，故韩愈曰：“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¹²⁸

¹²⁴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册，页264。

¹²⁵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册，页207。

¹²⁶ [清] 陈景云撰，《钦定四库全书·韩集点勘卷三》，第1075册，560-561。

¹²⁷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79。

¹²⁸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276。

若河北有多慷慨悲歌之士，则董氏此行必“有合”即得到赏识，于其而言不失为一个好去处。然则，此地早已不复古时，已“风俗与化移易”¹²⁹，河北藩镇割据一方，与朝廷相持不下，故董氏此行未必“有合”。天子不“明”，科举制度弊端丛生，人才流失乃韩愈心中之痛，故其也无法说服董氏留下，只能请其寻找市井里如高渐离一般的屠狗者以出仕。河北市井里的“屠狗者”韩愈也要请其入仕，可见其对董氏入幕河北一事之态度不言而喻。是故，韩愈委婉劝董氏勿做出“不异于古”¹³⁰之事，勿与国家为敌。

朱熹云，斯篇言燕、赵之士，以为其性仁义，然而他们背道而行，不忠不孝，具好乱之心，故而末章以道德之风以警醒之，此文之旨含蓄微妙，读者可详细品味之。¹³¹又，储欣曰：“此序惟朱晦庵得其意义所归，谓是深讥燕、赵之不臣，而其卒道上威德以警动而招徕之，其旨微矣。”¹³²愚以为，韩愈并无讥意，更多的是万般无奈，数道“董生勉乎哉！”，留人之心委婉至极。虽然天子有未“明”之处，然终究为一国之君，需有明智之臣辅助；而藩镇势力虽然多加赏识、重用，但终究是与国家对立。末句“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乃韩愈之立场，足见忠君、报国下之心尤为强烈。若天子“明”矣，国家便不会让“感慨悲歌之士”隐姓埋名，不问朝堂事，甚至投靠“燕赵之地”了。

此般惜才之态度于石生及温生的序中亦有所展现。河阳节度使乌公于元和五年相续招揽石洪及温造入幕。为此，韩愈赠序于二人，《送石处士序》乃受人请托而作，《送温处士序》乃自愿而作。文章中，韩愈并无按例介绍石洪及温造的情况，而是以乌公求才作为切入点。¹³³韩愈于前文夸赞了乌公有识人之目，礼贤下士，犹如伯乐识马。据

¹²⁹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277。

¹³⁰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277。

¹³¹ [宋]朱熹撰、曾抗美校点，《昌黎先生集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6，页140。

¹³² [清]储欣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唐宋八大家全集录五十二卷》（济南：齐鲁书社，1997），第404册，352页。

¹³³ 如《送石处士序》云：“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求士于从事之贤者。……于是撰书词，具马币，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庐而请焉。”[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312。《送温处士序》载：“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

《新唐书·乌重胤传》载，乌公“出行伍，善抚士，与下同甘苦。待官属有礼，当时有名士如温造、石洪皆在幕府。”¹³⁴足见乌公有礼贤下士之雅量，并非韩愈夸大其词。纵然如此，韩愈也深知藩镇与中央之依附性与游离性，但其内心仍对乌公怀有芥蒂。韩愈信得过石洪，故曰其以道自任，也对乌公怀有敬意，言其“以义取人”但藩镇为祸，无法令其安心。

为此，韩愈假托执爵之士之口，抒己之论。¹³⁵韩愈透过他人之口委婉表示乌公最重要的是保持初心，为国为民，而非个人家族利益，因此不能听信谗言，善待下属，效忠朝廷；石洪则不应该谋求私利于乌公。由此观之，韩愈于乌公之辞，劝勉之情要更强一些。如此言辞更使得韩愈之劝谏更加委婉得体，故孙琮道：“写尽乌公，却不曾一笔从乌公身上实写，文字遂觉松快无比。”¹³⁶

《送石处士序》与《送温处士序》述及同一事端，然前者以叙事及对话为主，后者则以寓言开篇，言辞更为强烈。若说韩愈对乌公招揽石洪一事心有芥蒂，那其对温造的相继入幕，不满之情更为强烈。其表示石、温二位一走，当地官僚事情有疑惑不解之处无法妥善处理，年少后辈亦无可问学业者，足见韩愈对乌公招揽两位儒家泰斗入幕一事颇有怨言。实则，其所忧者更在于，若天下贤才皆为藩镇所挖去，则朝廷再无可用之士，朝政将力弱藩镇势盛，是其忧虑所在也。

然则，其无法真正对乌公表达不满，唯能借表达“私怨”之方式以赞其择良才之优异手段。使乌公阅之不胜欣喜之时，亦表露其忧国之心思。林纾先生评析二序之异，表示石洪和温造写的序言虽然都是描述同事事件，但在行文和文风上却大不相同。石洪的序

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315。

¹³⁴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乌重胤传》，第5册，页4022。

¹³⁵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314。

¹³⁶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昌黎文钞》，第1册，页299。

言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记载，他的关注点完全集中在乌公身上，故在文末的祝词中，他经常担心乌公可能成为藩镇之患，此乃昌黎托石生以示讽刺的手法。他的文字严谨严肃，每个词都斟酌使用，从不草率。在送温生的序中，石生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使得行文稍显轻松。但是他对乌公得到许多士人的问题有所不同，不像前作那样严厉。他表达了乌公抢走了二人，心中无法释怀的情感，并将私人的怨恨表露无遗，极力写出自己的不满。但乌公看到后却非常高兴。这就是文字中的巧妙之处，既狡诈又感人。¹³⁷ 温生的序比起石生的序，更显灵活滑稽，可见前者笔调庄重，后者则情绪饱满，不禁表露私怨，但处理得委婉且得体。然观之，韩愈所示之“私怨”，实乃反映了中唐时期诸藩镇势力之膨胀，其威势之盛不容忽视。

¹³⁷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7册，页6462。

第四章、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书写对象

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书写对象，一则书写藩镇首领；二则书写与藩镇有涉、之人，如牙兵、藩镇领地之刺史及藩镇幕僚。韩诗多描绘藩首，而韩文则更着重描写藩镇领地之刺史及幕僚。兹就以上内容，下文对此展开相关论述。

第一节、藩镇首领之书写

韩愈以藩首为主要对象之诗篇，触及割据与非割据之藩镇。割据型藩镇如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屡次兴起叛乱，对唐王朝构成重大威胁。是此，针对韩愈的割据与非割据藩镇之书写，其诗篇呈现两种创作目的。其一为强烈批判发起内乱的非割据型藩镇及谋反朝廷的割据型藩镇。前者的诗篇有《古风》等诗，后者则有《归彭城》、《过鸿沟》等诗；其二为委婉劝谏，如劝谏徐州节度使张建封、河中节度使王锷积极讨伐谋反的藩镇势力，为朝廷效力。

相比之下，以藩首为主的散文甚少，且仅及于非割据之藩镇。其撰述目的乃干谒。譬如韩愈早年间曾为了科举考试、官职及钱财原因，向义成军节度使贾耽、凤翔节度使邢君牙示好。然而，《与于襄阳书》却备受后人诟病，因为此文的干谒对象却乃嚣张跋扈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由此可见，韩愈早年窘迫之际曾向非藩镇势力妥协，但其示好的对象仅限于非割据型藩镇，可见不与割据型藩镇有所关联乃韩愈的原则。要之，韩愈诗文中涉及藩首的作品主要有三，即批判造成军事纠纷的藩镇、劝谏非割据型藩镇讨伐叛乱的藩镇势力及对非割据型藩镇行干谒之举。

第二节、藩镇相关人士之书写

除藩首之外，与藩镇相关者，有藩镇牙兵、刺史及幕僚。韩愈以彼等为主要对象之诗篇较为稀少，如《送侯参谋》一诗乃送友人侯继赴河中节度使王锬处担任幕僚。虽然表面上的书写对象乃侯继，可实际上书写的主要对象却是藩首王锬，希望王锬上书朝廷扫除王承宗及吴少阳这两股割据型藩镇的势力。虽皆为送友入幕非割据藩镇，然于《送石处士赴河阳幕》中对石洪却更具不满之意，以今天下不太平，石洪身为儒家泰斗而不对国家有所作为，故韩愈暗示其幕主乌公宜效忠朝廷之时，亦流露出对石洪之不满。次则，韩愈诗歌中的创作对象也包含了藩镇牙兵。如《汴州乱二首》中，韩愈之态度颇具玩味，因其于诗中叙事与史实叙事不符，将导致汴州乱的罪魁祸首归罪于叛乱之牙兵，而史实则将此归咎于陆、孟等上位者。足见，韩愈入幕汴州藩镇董晋幕下，与幕僚陆长源、孟叔度等人的友情确实影响了其判断之准确性。

相比诗篇，韩愈以藩镇相关者为主的散文较多，主要对象包括入幕藩镇之幕僚及在藩镇领地任职之刺史。《赠崔复州》及《送许郢州》乃韩愈为即将远赴山南东道任刺史之友人所作，然其文章表面虽劝谏友人，实则写作之真正对象乃当地藩首于頔，旨在委婉劝谏其勿贪急于敛财，应廉洁自守。再者，《送石处士》及《送温处士》亦同属此类带有言外之意之文章。此二文表面虽为送友赴幕于河阳，实忧虑河阳藩首乌重胤三番两次招揽德高望重之文人入幕，恐其将如虎添翼，难以控制，同时亦致朝廷人才匮乏，损害朝政。与前者相比，其于《送董邵南》一文之态度有异，言外之意更加明显，因董氏赴任之地属割据型藩镇之一的河朔藩镇。其多次暗喻友人河朔并非好去处，并暗示其勿与国家为敌。值得注意的是，前文虽然对石氏及温氏入幕藩镇持隐晦之反对态度，但对

董氏入幕河朔藩镇之事则反对意见更为明确显著。

要之，韩愈诗文中涉及与藩镇相关者的作品旨在送别友人及批判发动内乱的牙兵。然则，此类送别友人的文章大多意有所指，明面上乃送别赴任刺史或幕僚的友人，但其实也带有劝谏诸非割据藩首对目的，即劝谏非割据藩镇讨伐作乱之藩镇、劝谏藩镇廉洁自律及表露出对非割据型藩镇的忌惮。

综上所述，韩愈始终持对发动叛乱的割据及非割据藩镇持反对之态度，但在并无发动叛乱的前提下，韩愈对后者之态度则视处境而定。如其生活遭遇困难时曾向非割据型藩镇示好，然非因其与藩镇关系不清白，此乃出于其立于个人立场以考量其生计。然则，其立于国家立场时，对非割据型藩镇则有双重态度，既期望其为朝廷讨伐叛乱藩镇，又担心其势力将反噬朝廷。纵然如此，韩愈面对非割据型藩镇时，其个人与国家立场并不冲突。然实际冲突乃在其对待入幕藩镇之文人，其立于个人立场时明白友人仕途之不顺系出于时世环境所致，但立于国家立场时，其无法完全接受友人投奔随时将会背叛朝廷之藩镇，此亦韩愈藩镇书写中所显现之矛盾。故欲考察韩愈笔下藩镇之书写，必须审慎思量其创作时之立场及对象，方能还原其藩镇书写之真貌。

结语

韩愈诗歌中之藩镇书写，可分为军事纷争及文人送别之题材。军事纷争类，分为贞元、元和及长庆时期也。散文中的藩镇书写，则分为干谒之文及赠序之文。干谒文之题材，为科举引荐、官职引荐、入幕自荐及施财请求；赠序文之题材，则为官僚赠序及入幕赠序文。经考察，韩愈之藩镇书写，可探讨之层面有三：即书写中之创作对象、对不同创作对象之态度，及其心态之变化。

韩愈之藩镇书写所涉及之对象众多，主要可分为藩首与其余与藩镇有关者。韩诗多侧重于描写藩首，而韩文则更着重书写与藩镇有关之人士。其藩镇书写中之藩镇分为割据及非割据型，而与藩镇有关者则包括叛乱之藩镇牙兵、赴藩镇地域任职之刺史及幕僚。对于此两类创作对象，其对待二者之态度亦有所差异。此种差异体现于其立场之层面，即个人与国家的立场之反映。

基于其长期植根于儒家思想的社会背景，维护国家权威成为其思想之一，故对于站在唐王朝立场的韩愈而言，藩镇带有贬义色彩。然则，当韩愈的生活，如科举、仕途不遂其心时，其必须立于个人立场，为生计而屈身求于非割据型藩镇。由于所有类型的藩镇具有游离性，非割据藩镇虽并不与朝廷对立，然他们仍有能力随时兴兵叛逆或支持割据型藩镇反叛朝廷，是以韩愈对其不全信任，而存慎防之心态。对此，韩愈从不私下与割据型藩镇交涉，入幕非割据型藩镇及对其干谒乃韩愈与藩镇交涉的底线。尽管曾对非割据藩镇面前摆低姿态，但韩愈亦对他们有所劝谏，可见韩愈与非割据藩镇交涉时，不忘本心，仍持为国为民之心。

当韩愈释褐，被委以朝廷官职之后，其身份的转变必然得让他立于国家立场，以国家之利益为念。对于非割据型藩镇则不复以往那般低姿态，反而持有双重之态度。韩愈一方希望非割据藩镇得以制衡其余意图发动叛乱的藩镇，一方面则忧其羽翼过于丰满，

威胁朝廷之安危。是此，友人赴任藩镇领地担任幕僚之事，其对此持有矛盾的心态。韩愈立足于个人立场，深知友人赴任藩镇，乃科举制度之弊端导致他们仕途失利，韩愈位他们感到惋惜及痛心。然而，立足于国家立场，其难以全然赞同友人入幕藩镇，尤其是割据型藩镇。对于非割据藩镇，其唯能以委婉之言挽留之；对于割据藩镇，则态度更为坚决，因为前者或可谅解，而对后者之行为，韩愈则不以为然，但其无以对现况有所作为，唯能以复杂之心情送别之。

韩愈的心态变化，可以从他的诗歌看出来。贞元年间的诗歌较为忧时感伤，元和年间的诗歌较为轻快明朗，而长庆年间的诗歌则不似元和诗歌般快腔快调，而更加从容及淡泊。此般变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如德宗于贞元时期姑息藩镇，故其诗歌显得忧心忡忡及充满批判。宪宗于元和时期对藩镇采取强势的策略，且韩愈这段时期夙愿达成，成功参与淮西一役为国效力，故此时的情绪较为激昂，但穆宗时期其已年老，且历经大风大浪，故其显得更加沉着。是此，韩愈的心态变化，也得以从其诗歌中的内容窥之。

要之，韩愈诗文中诸多关乎藩镇之题材，其对待割据型藩镇之态度始终抱有反对之意，而对于非割据型藩镇及入幕此类藩镇之人则呈现出双重态度。后人不可因韩愈与非割据藩镇之交往，便断定其对藩镇之立场不一，其对于藩镇割据之立场一向坚决否定。鉴于其藩镇书写文意纷繁复杂，故欲探究藩镇书写之全貌，必须考虑韩愈所处之环境及其个人经历，方能真正了解其藩镇书写之意旨与全貌。

参考文献

古籍

- [清]陈沆撰，《诗比兴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清]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清]陈景云撰，《钦定四库全书·韩集点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075册。
- [清]储欣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唐宋八大家全集录五十二卷》，济南：齐鲁书社，1997。
-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
- [清]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
- [清]乾隆御选、梁诗正辑评，《御选唐宋诗醇》，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
- [清]孙星衍撰、陈沆，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
- [清]方成珪撰，《续修四库全书·韩集笺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吴廷燮撰，《唐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
- [清]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明]胡震亨撰，《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宋]方崧卿，《钦定四库全书·韩集举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073册。
- [宋]司马光编、[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 [宋]司马光撰、王云五主编，《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
- [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
- [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
- [唐]韩愈著、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唐]韩愈著撰、[宋]魏仲举集注，《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
- [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唐]韩愈撰，方世举笺注，《韩愈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
- [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 [晋]郭璞撰，《山海经》，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
- [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
- [三国]诸葛亮著、段熙仲，闻旭初编校，《诸葛亮集》，北京：中华书局，2020。
- [汉]班固撰、[清]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汉]司马迁撰，泷川龟太郎著，《史记会注考证》，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
- [汉]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专书

- 陈克明，《韩愈述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2019。
-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钱穆著，《中国文学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专章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王水照编，《历代文话》，页6437-652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钱穆著，〈记唐文人干谒之风〉，《中国文学论丛》，页300-313。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清]孙星衍撰、陈沆，盛冬铃点校，〈尧典·上〉，《尚书今古文注疏》，页1-30。北京：中华书局，1986。

[清]方宗诚撰，〈读文杂记〉，王水照编，《历代文话》页5713-573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宋]司马光撰、王云五主编，〈颜乐亭颂〉，《司马文正公传家集》，页824。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期刊论文

陈昱杉，〈藩镇割据对韩愈创作及文学观的影响〉，《炎黄地理》2023年第6期，页20-22。

屈光，〈韩愈与藩镇的关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页47-49。

王隼，〈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比较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页145-151。

游胜辉〈论韩愈干谒文中的自我形象塑造〉，《彰化师大国文学志第》2018年第

36期，页65-94。

俞钢，〈唐代进士入仕的主要途径及特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页94-102。

学位论文

韩立新，《唐代干谒诗中的士人形象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李楠，《元和平藩诗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附录

时期	作品	作品种类	内容
贞元	《上贾滑州书》	散文	科举引荐
	《古风》	诗歌	军事纠纷（内乱）
	《与凤翔邢尚书书》	散文	官职引荐、自荐入幕
	《汴州乱二首》	诗歌	军事纠纷（内乱）
	《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	诗歌	军事纠纷（内乱）
	《赠河阳李大夫》	诗歌	军事纠纷（内乱）
	《赠张徐州莫辞酒》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汴泗交流赠张仆射》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归彭城》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与于襄阳书》	散文	官职引荐、施财
	《赠崔復州序》	散文	送别藩镇刺史
	《送许郢州志雍序》	散文	送别藩镇刺史
元和	《秋雨联句》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征蜀联句》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张中丞传后叙》	散文	歌颂平藩将领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散文	送别藩镇幕僚
	《送侯参谋赴河中幕》	诗歌	送别藩镇幕僚
	《送幽州李端公序》	散文	送别藩镇幕僚
	《东都遇春》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送石处士赴河阳幕》	诗歌	送别藩镇幕僚
	《送石处士序》	散文	送别藩镇幕僚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散文	送别藩镇幕僚
	《月蚀诗效玉川子作》	诗歌	暗讽藩镇
	《与鄂州柳中丞书》	散文	军事纠纷（叛变）
	《赠荆部马侍郎》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过鸿沟》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送张侍郎》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奉和裴相公东征途经女几山下作》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晚秋郾城夜会联句》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郾城晚饮奉赠副使马侍郎及冯、李二员外》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酬别留后侍郎（蔡平，命马总为留后）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同李二十八员外从裴相公野宿西界》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过襄城》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宿神龟招李二十八冯十七》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和李二十八司勋过连昌宫》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次硤石》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桃林夜贺晋公》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次潼关上都统相公》	诗歌 5	军事纠纷（叛变）
	《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祭鳄鱼文》	散文	暗讽藩镇
长庆	《奉使镇州行次承天行营奉酬裴司空相公》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镇州初归》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总共： 45 篇		诗歌： 33 篇	
		散文： 12 篇	

附录1:韩愈作品中涉及藩镇书写的诗歌及散文

题材		篇数	比例 (%)
军事纠纷	藩镇内乱	4	91
	藩镇叛乱	26	
文人送别	送别藩镇之幕僚	2	6
托物讽刺藩镇		1	3
共计		33	100%

附录2:韩诗中的藩镇书写题材比例

题材		篇数	比例 (%)
干谒	科举引荐	1	25
	官职引荐及自荐入幕	1	
	官职引荐及施财	1	
文人送别	送别藩镇领地之官僚	3	50
	送别藩镇之幕僚	3	
歌颂平藩将领		1	8.33
藩镇叛乱		1	8.33
托物讽刺藩镇		1	8.33

共计	12篇	100%
----	-----	------

附录3:韩文中的藩镇书写题材比例

作品	集评资料
《古风》	陈沆：“刺赋役之困也……安、史之后，方镇相望，跨州连郡。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军旅不息，重敛因之。”
	何焯：“‘幸时不用兵’，盖以兵方自此不解，正言若反也。”
	胡渭曰：“本识赋役之困。民无所逃。却言时不用兵。正宜甘食好衣。相与为乐。辞弥婉而意弥痛。”
	何焯云：“‘《平准书》：杨可告缗，杜周治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托之方镇，以觉其上者也。”
《汴州乱二首》	蒋抱玄曰：“此谓德宗姑息养乱，不肯严于讨伐也。”胡渭曰“此诗一章议四邻坐视，二章议君相姑息也。”
	胡渭曰“此诗一章议四邻坐视，二章议君相姑息也。”
	杨慎云：“三军怨怒，遂执长源及杨、孟杀之。由是论之，是长源有以自取。”
《赠张徐州莫辞酒》	方世举曰：“按公以二月暮至徐，此云‘春雷三月不作响’……未闻建封有请讨之举，故以大义动之。”
	蒋之翘评：“当时四方多警，朝廷无讨贼之意，而诸将亦不奉命，故以大义推辞‘春雷’之语，意有所讽也。”
《汴泗交流赠张仆射》	唐宋诗醇云：“‘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盖讽之也。”
	方世举云：“此盖问其军政不修。”
《归彭城》	《唐宋诗醇》云：“忧时伤乱，感愤无聊。骑马空陂，不减穷途之哭。”
	查慎行云“一肚皮不合时宜，无所发泄，于此章吐之，究竟不能尽吐。”
《过鸿沟》	韩醇曰：“汉高帝四年，项羽与汉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东为楚。羽解而东归，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练，乃止。”
	王元启曰：“此真劝回马首之论也”

	蒋抱玄曰：“能将力主讨蔡隐衷曲曲道出，是借古规今，绝妙文字。”
	方世举评：“此诗虽咏楚、汉事，实为伐蔡之举，时宰有练阻者，几败公事也。”
《奉和裴相公东征途经女儿山下作》	程学恂曰：“同心破贼，故尔十分高兴。”
《奉使常早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	方世举注曰：“诗序：蟋蟀，刺晋僖公也。” 方成珪曰：“雪王廷湊罪，复以为节镇，非公意也。故此诗有微词焉。地失嘉禾，言太平无象。风存燃噀，警太康也。结则忧深思远，可于言外得之。”
《送侯参谋赴河中幕》	顾嗣立曰：“《汉·李广传》言‘威稜愴乎都国’，李奇曰‘神灵之威曰稜’”
《送石处士赴河阳幕》	张鸿曰：“有讽意，合之送序，公意可知。”
《与于襄阳书》	《颜乐亭颂》议此书云：“《与于襄阳书》谓先达、后进之士，玄为前后以相推援，如市贾然，以求朝夕努米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 刘咸炘曰：“于頔之为人无足取，其文亦何美？而韩子上书乃以有言浑浑噩噩为颂，几于谀矣。” 方宗诚则为之缓颊：“昌黎之上书求人，原欲出而济世，非尽出于干富贵之鄙怀。然究竟止当存忧天下之心而守素位而行之分，不当如此急急也。”
《送许郢州》	樊汝霖云：“郢、复在唐悉隶山南东道，公《送许郢州》及此崔复州二序，皆言及于公。于公名頔，字允元，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赠崔復州》	陈景云云：“《诗·硕鼠》曰：‘刺重敛也。其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此序专为于頔重敛而作，与诗人所刺同。发端先言‘小民不得其所，能自直于乡里之吏者鲜’，盖即用《诗》语而反之。民穷敛急，惟仁人至，庶有来苏之望，曰‘崔君之仁，足以苏复人’，痛乎其言之矣。”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朱熹云：“此篇言燕、赵之士，仁义出于其性，乃故反其词，深讥其不臣而习乱之意，故其卒章又为道上威德以警动而招徕之，其旨微矣，读者详之。”
	储欣曰：“此序惟朱晦庵得其意义所归，谓是深讥燕、赵之不臣，而其卒道上威德以警动而招徕之，其旨微矣。”
	林纾曰：“石洪、温造二序，人同事同，而行文制局，乃大不同。石洪本无可纪，着眼全在乌公。文末祝词，恒患其为藩镇之祸，此昌黎托石生以示讽也。文至严重，句斟字酌，一字不肯苟下。《送温生序》，有石生为媒介，着手稍易。但序乌公之多得士，与前作已稍别，不至相犯。说乌公攘夺其友，不能无介于怀。又言致私怨于尽取，极意写己之不满。然乌公见之，则大悦矣。此文字之狡狴动人处。”

附录4: 论文的集评资料汇集

